

空间性、媒介化与城市造像

文化诗学 与城市审美

徐国源 主编



空间性、媒介化与城市造像

文化诗学 与城市审美

徐国源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性、媒介化与城市造像:文化诗学与城市审美/
徐国源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2856-9

I. ①空… II. ①徐… III. ①城市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7473 号

责任编辑 马瑞瑞

封面设计 储平



空间性、媒介化与城市造像:文化诗学与城市审美

徐国源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2.5 插页 3 字数 309,000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856-9/G · 1710

定价 50.00 元

本书由苏州大学重点学科经费资助出版

主 编 徐国源

执笔人

第一编 钟 靖

第二编 邹欣星

第三编 韩素梅

第四编 王 强

目 录

导论 “城市转向”与城市文化诗学	— 1
------------------	-----

第一编 城市风景：空间、语法和意象

第一章 城市构造和“语法”	— 33
第二章 城市“公共空间”	— 65
第三章 “空间性”与城市意象	— 105

第二编 诗性空间：“隔岸”的文学之城

第四章 文学：走进城市频道	— 133
第五章 “镜中之镜”与文学之城	— 146
第六章 城市“病理学”及文学招魂	— 160

第三编 奇观空间：“魅惑”的媒介之城

第七章 “媒介之城”及认识论	— 205
第八章 快城快客：城市化进程中的媒介	— 217
第九章 媒介城市第一空间 ——新闻中的城市叙事	— 234

第十章 媒介城市第二空间	
——想象性的城市表述	— 254
第十一章 媒介城市第三空间	
——结构与建构的媒介与城市生活	— 284
 第四编 “美好城市”：重构城市美学	
第十二章 美好城市：城市理论的探索与实验	— 313
第十三章 城市：以“人”为尺度的“幸福空间意象”	— 333
第十四章 重构城市美学：从“城市美化”到“生活美学”	— 343
 主要参考书目	
	— 351
 后记	
	— 353

导论 “城市转向”与城市文化诗学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乡村社会向现代都市社会的中心转移,原来隐身“乡土中国”的城市逐渐成为分析主角和意义之所,这恰与文化地理学的空间转向相应和。同时,在人文领域,学者的关注也开始由单纯的城市文学,转向城市的“空间性”、“媒介化”及其与城市文化的互生关系这一本身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开始从个体城市感受及城市表征进入“文化诗学”的城市研究。

一、发现“城市”

与西方社会不同,在费孝通命名的“乡土中国”的地方,人们似乎对传统乡村更为谙熟了,土地、树林、田野、河流、村寨、茅舍、耕牛、牧童……它们如此和谐地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构成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底色。

“城市”,尽管在功能意义上古已有之,如唐代的长安、宋代的汴梁、元代的大都、明清的苏杭,等等,她的轮廓与表征,历史与传说,浮华与喧闹,与诗词绘画、通俗文学、传奇故事一起,构成了中国人共通的集体想象,但也仅限于

此，“城市”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乡村小镇的人来说，始终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经验性”断裂和障碍，换言之，“城市”只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化”的客体，一个奇观，一个隐匿于中国文化边缘的“场所”。

（一）“城市意识”的觉醒

中国城市的形成与西方城市的兴起有明显的差异。汉语中的“城市”是古代“城”与“市”两个概念的结合。“城”是指在一定地域上用作防卫而围起来的墙垣，《墨子·七患》中写道：“城者，所以自守也”，可以看出“城”的功能明确指向政治需求和军事防御。“市”在古代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易经·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吕氏春秋》说得更明白：“筑城以为君，造郭以为民”，不难推知，“市”是在“城”产生以后因日常生活的需要才慢慢形成的。显然，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里，“市”的功能明显附属于“城”。

在鸦片战争前，我国城市基本上为国都以及各郡、州、县府衙所在地，并且从当时的城市规划和布局来看，也可以明显感觉到城市空间是以府衙作为中心点向四周延伸扩散的。缘于城市的政治、军事需求，城墙成为中国古代城市最为明显的地标建筑，不仅是城市地理空间的分界线，而且框定了城市地缘空间的大小，城墙之内是行政中心、商业集市，城墙之外是乡村。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1914年上海“因城垣阻碍，县市难兴”，城墙几乎全部拆除，一个具有现代意义指称的城市——“上海”的雏形基本构成。^①城市从消费属性向生产属性的扩展，寓示着城市从传统意义上的因“城”生“市”的结合体慢慢蜕变为现代“城”与“市”指向同一意义的“城市”。

一些研究者指出，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与乡村始终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城市与乡村的发展是相互依赖的，表现为“同质异型”的差别统一。一直以来，中国传统城市与乡村的贸易关系以单向贸易为主，城市极少生

^① 顾廷培：《漫说上海的城墙》，载施福康主编《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产物资流向乡村,城市只是为来自乡村的商品交换者提供了一个集中交易的场所。故而从城市人群的“身份”而言,市民与农民其实并无根本差别,唯一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是否拥有土地,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普通的市民在身份上甚至是低于农民的。因为乡村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中心,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城市没有独立的生产功能,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对乡村有极强的依赖性,乡村所能提供的农业生产力限制了城市脱离乡村。有学者指出,“认为城市代表了一种高于乡村文明的独特类型的观点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司空见惯,而在传统中国却不然”。^①

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以前,作为人口集居地的城市,虽然商铺、茶馆、酒肆、妓院等体现着一种与乡村大相径庭的生活方式,但城市和乡村用来认识世界、审视生活的价值观念几乎完全一致,而且主要来自于乡村农耕生活孕育的意识。城市与乡村同样维系在自然经济的古老轨道之中,在政治上是城市占主导地位,在经济上是乡村占主导地位,两者彼此相互作用和制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各自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行政分割的等级区分和地缘差异上,并非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差异。这种“城乡一体”的状况说明,在传统中国,城乡差异既不是决定个人身份的原因所在,也非文化等级和权力关系构造的主要因素,中国古代并无明显的“城”“乡”分野。“整个古代中国都是乡村性的,因此它没有必要独立出一个‘农村’(或‘城市’)来。它的城市是乡土的、田园的自然经济的一个合理的延伸,它的市井社会是整个乡土社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②

在中国,“城市”的概念,或者说关于城市的新意识,是伴随“现代性”观念的楔入而带来的副产品。城市,只有被打上强烈的“现代”印记,它在文化上的“自足性”才能显现出来,“因为中国的城市从农村脱胎而来,它经常是放大的乡村,城市的街道、市井与胡同,离乡村并不遥远,那里的人们也依然带着泥土的气息,具有农民的朴实与执著。”^③由于长期置身“乡土中

① Mote, F.W.,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p.102.

② 张未民:《批评笔迹》,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③ 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国”的大环境，即便到了20世纪初期，“城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然是陌生而新鲜的。20世纪30年代，在作家茅盾的笔下，上海熙熙攘攘的街头景象和NEON(霓虹灯)映照，以及散发出的“LIGHT, HEAT, POWER!(光、热、力)”无穷的能量，终于暗示了人们一种崭新的“历史真实”：西方现代性的到来。她吞噬性的力量极大地震惊了主人公的父亲——一个传统中国的乡绅，似乎也可看作是乡村文明的代表迅速命赴黄泉。李欧梵先生在他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一书中，列举了30年代上海许多具有现代元素的物质象征之后分析道：“这些舒适的现代设施和商品并不是一个作家的想象，相反它们是茅盾试图在他的小说里描绘和理解的新世界。简言之，它们象征着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而像茅盾那样一代的都市作家在这种进程前都表现了极大的焦虑和矛盾性。”^①

作为帝国主义炮舰强行把中国带入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上海这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其实并没有经历长时期的工业文明初始期，而似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具备了工业文明成熟期的特征，因此当那些从乡村、小城镇走出的人面对上海新世界的浮华时，反而感到极大的不适应和某种焦虑。其实也是难免的，因为从“乡下人”转变为“城里人”，最终融入市民中去，不仅是生活空间改变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从世代传承的以村落“家族本位”观念转变到以社会群体为中心的市民生活观念，而这是需要经过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的。从“乡民”到“市民”的“城市化”转换过程，其实质是人的文明意识的复杂转化过程，包括生活习惯、行为规范、公共准则、法治观念等培育问题。概言之，这是“新生活”经验的融合，它显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的意识的流动性。“在艺术家的画布上，描绘对象不再是往昔的神话人物，或大自然的静物，而是野外兜风，海滨漫步，城市生活的喧嚣，以及经过电灯照明改变了都市风貌的绚烂夜生活。正是这种对于运动、空间和变化的反应，促成了艺术新结构和传统形式的错位。”^②很显然，

①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②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3页。

只有当城市随“现代”进程被进一步放大,直到离乡村足够遥远,看不到多少乡土中国的影子,甚至它就是西方大都市的模仿或翻版时,这样的“城市”才会变成具有独立意义的主体和审美对象。

在这一“转化”过程中,除了建筑、马路、咖啡馆、戏院等现代物质表征给人以“摩登”想象之外,还不能不提及一个肉眼看不到的现代化工程,即构成都市文化一部分的大众读物的“启蒙”影响。李欧梵先生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下文简称《上海摩登》)和范伯群先生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这两本对城市文化研究极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中,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得出同一结论:晚清以来,中国人的市民意识是“读”来的。以上海为例,除报刊、出版和学堂之外,晚清上海还拥有众多贴近民众的、更为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样式,如画报、戏曲、小说、电影、曲艺等等,它们以自己独具的魅力吸引读者和观众的视线,成为他们增长见识和休闲消遣的另一渠道。其实,这种大众化的艺术样式就是市民文化,其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娱乐消遣,丰富市民的闲暇生活;二是以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有效地灌输近、现代意识。对于后者而言,云蒸霞蔚的都市大众文化以“最贴身贴心的人文关怀”,成为乡民从小农思想转轨到市民意识上去的辅导读物,“它更是近代市民意识萌生与滋长的触媒,或者说是近代市民的启蒙教科书。”^①

(二) 都市:文化的结构体

按照上海历史学者唐振常的看法,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似乎比它的“精神”层面更容易被中国人接纳,至于上海这个最具有“典范性”的都市标本,它对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形式明显遵循了一个典型的步骤:“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②这个“典型的步骤”,似乎同样可以用来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都市发展的轨辙。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人们一般

^① 范伯群:《建构多元“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实与理论依据——撰写〈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时思考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08年第5期。

^② 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页。

认为，现代中国的都市景象与西方发达国家已没有根本的差异，以致许多国内学者开始惊呼，中国的城市已完全逐弃了中国传统城市文化的精髓，而过于全盘“西化”、“洋化”了。

有学者指出，在理论界与社会思潮史中，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首创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一直被看作是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主要标志，而实际上，这一看法是不全面的。如果从全局性、深层次与战略发展的角度看，变化最大、发展最快、意义举足轻重、最能代表中国改革开放实绩的，无疑是在“乡土中国”上迅速繁殖、成长和扩张着的城市、“大都市”与“城市群”。^①据《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分析，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0%，城乡人口将平分秋色；到2020年将达到60%，届时中国将进入基本城市化的阶段；到2050年预计达到75%，成为一个都市化国家。

改变的不仅是城市数字，更重要的是目前正在持续推进的都市化，它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结构发生了激变，即把一个传统的乡村社会迅速推向现代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其特征是：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集中，城市数目增多，都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那种缓慢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已不再是主流的、随处可见的生活图像，而逐步转向高速度、强色彩的都市生活情调。过去，社会学家费孝通用“乡土中国”这一观念形态，描述概括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特征，但是，随着“都市化”的急速展开，以及80年代以后由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农村逐步扩散到全国的“城镇化”，那种现代社会的商品交换原则迅速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法则。原来粘联在乡村土地上的人们，汇入城镇或都市，步入了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快节奏运动中，“流水线上的节奏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节奏。它在大街和大众中得到应和”。^②原来居住在农村的人们不仅获得了一种新的城市身份，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由此，他们原先生活在乡村中的“时间”和“空间”感觉都被“虚空化”和“抽象化”了（吉登

① 刘士林：《中国城市发展三十年镜像》，《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4月14日。

② 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传播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刘利群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斯),现代意识培育了一种对传统社会的“游离机制”。

“都市”作为对立干“乡村”的文化符号,在中国也有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在今天,最能体现城市现代意义的,当然是现代大都市。现代都市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是城市发展的极致。较之于传统的城市,它通常是中心城市,不仅基础设施、文化设施、交通通讯更加完备,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也更为显著。尤其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现代都市的意义,已超越规模性的庞大,而越来越表现在它的辐射力和感召力上。城市学者康斯坦丁·多西来蒂斯就指出:“事实上,‘城市’这个字眼包括很多东西……清楚划分的空间,以‘聚居之地’界定城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四处蔓延,已变成一个动态的有机体。一个大城市,往往把外围的小城市和村落吸纳,然后再向外扩展;一个小的城市,则会沿着一些公路及乡村的道路伸展。”^①这种现代都市的布局形式,书写出与过去任何时代不同的文化地图学,同时也培植出与传统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

现代都市不仅形成一种与传统不同的现代生活方式,同时也孕育出许多新的文化标志和表征。“都市文化不是传统文化合乎逻辑的自然进展和延展式发展的结果,而是对于以工业化以至今天的信息化为基础而导致社会变革的回应。”^②现代都市本质上是经济型城市,其竞争主要集中在以 GDP 为标志的硬实力方面。但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制约与当代都市经济的新特点,发展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焦点与重心。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与发展进程中,人的创造性能力与智慧、创造性思想与规划,成为决定城市兴衰与命运的关键,这也是文化创意及各种文化产业在当下日趋兴盛的根源。

都市不只是一个拥有街道、建筑和公共设施等物理意义的空间和社会性呈现,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上的结构体。它存在于城市文本的表述、接受与解析过程中。德国评论家克劳斯·谢尔普(Klaus Schrpe)通过对大量关涉城市的文本作出科学分析之后,将“城市表述”分为四类,华裔美籍学

① 转引自纪晓岚:《论城市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18 页。

② 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 1 辑),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204 页。

者张英进对其概括如下：

第一类模式来源于德国 18、19 世纪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乡村乌托邦”和“城市梦魇”的直接对立。在这一模式中，一种早期的、据信是平静和安宁的主观主体受到新兴的工业文明的威胁。第二类模式见于“19 世纪批判社会的自然主义小说，其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退位于阶级斗争……城市的生活和经验被缩小为个人和群体的对立。”第三种模式见于现代的作品，其中“巴黎流浪子的沉思姿态”表明“城市经验的潜在的想象力”，其“审美主体自然而然地观察审美客体，用凝视的眼光捕捉和把握这客体”。第四类模式是“功能性的结构叙述”，通过这种叙述，“城市因其商品和人的剧烈流动而被重新构造为‘第二自然’，这一构造据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给自足，相辅相成的方式而产生。”换言之，在第四类模式中，城市成为自己的代理人，在文本中自由地展开自我叙述。^①

克劳斯·谢尔普对城市叙述的研究值得重视，他不仅勾勒出了城市发展和城市表述的历史关联，并认为在城市表述中贯穿着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脉络。这个观点，特别是对第四类模式的分析，对我们认识 1980 年以后的中国都市文化大有裨益。

经济因素决定了都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同时还孕育了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公共构造，带来了文化活动和娱乐方式的扩展，以及都市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空间的增长。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以异常的速度迅速行进，密集的高楼建筑、大量的人口流动、延伸的高速公路，展现出“都市”的勃勃生机。同时，由于受市场消费“无形之手”的推动，社会财富也快速向都市转移，于是在都市中迅即构筑起了新的“文化高地”：壮观而不失炫耀的现代建筑、公共设施，漂亮

^① 张英进：《都市的线条：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笔下的上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 年第 3 期。

的图书馆、博物馆,刺激的娱乐广场和休闲酒吧、大型的购物场所和炫目广告,还有众多传媒产业,如广播电视、报纸期刊、音像制品、歌厅网吧……这些现代物化景观及精神载体,感应着年轻群体的都市想象,同时也预示着新的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形式的出现。

(三) 城市:想象与表述

在“城市”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中,“想象”或“想象性”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和话语。作为心理学的名词,“想象”一词的含义是:“在原有感性形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这些新形象是已积累的知觉材料经过加工、改造所形成的。人类能想象出从未感知过的或实际上不存在的事物的形象,但想象内容总来源于客观现实。”^①在谈到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时,汪晖有个看法:想象这一概念绝不等同于“虚假意识”,或毫无根据的幻想,它仅仅表明了共同体的形成与人们的认同、意愿、意志和想象关系以及支撑这些认同和想象的物质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之,所谓“城市想象”其实就联结着创作者的城市生活经验,当然它也不简单等同于经验,而必须经过由经验到文本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想象性城市的叙述过程,如此城市想象也就可以认为是一种城市表述。^②比如关于“上海”的想象性叙事,现在流行的一些概念,像“三四十年的摩登上海”、“国际大都市”、“日常生活”、“欲望”、“时尚”、“消费文化”、“白领”、“小资”、“中西文化交往”等等,便是有关 90 年代以后城市表述者为读者提供的一个个“精确的”关于上海的公共想象,而不仅是个体性的对上海、对时代和世界的现实调查或实际体验。

对于城市想象,当然有多种表述方式。按照表述者的文化身份谱系划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作家、艺术家的高雅文艺(小说、诗歌、绘画等文本)表述的城市经典想象;另一种是市民大众的、通俗的消费性文化(影视剧、通俗歌曲、大众读物等文本)表达的城市大众想象。这两种文化想象的“分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96 页。

② 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文学评论》2007 年第 1 期。

离”有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反映了社会不同阶层以及因知识、身份差异而造成的不同的文化姿态、诉求和表达。一般来说，有关城市的叙事和表述是多元的、不统一的，甚至是非逻辑的，而在知识分子、作家对城市的想象性叙述中，却往往将它整体化、主题化、逻辑性起来，从而导出对城市的公共性认知和普泛性知识，而这恰恰是都市大众文化疏于或不屑表述的方面，大众文化通常按照“跟着感觉走”的经验范式书写另一种城市景象，这造成了“精英”、“大众”两种城市表述的分野。

李欧梵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上海摩登》中，试图重构旧上海物质文化生活和消费主义的精神时尚地图。他从研究“想象共同体”问题着手，即他认为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往往伴随着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并认定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都市性正是国家现代性的一种，因此“摩登上海”的想象，也正是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在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时，李欧梵借用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的理论，对印刷文化、媒介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以及再生产等城市文化生成与发展进行了描述，并特别以刊物、电影、流行文化为主要讨论领域，叙述城市对现代性的共同心理认同，从而剖析出上海城市现代性的特质。^①虽然在书中，李欧梵对中国早期的上海都市文化的表征仅作为作家“城市想象”的语境展开讨论，并没有将此作为中心作进一步聚焦和探讨，但也已揭示出，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的“公共空间”，已然滋生出一种新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都市文化”已经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初步形成。

90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急速发展，现代意义上的“都市”作为一种审美形态，迅即构成一个复杂而纠缠着的文化集合。王安忆的《长恨歌》一类“上海往事”叙述，成为这一时期经典的城市经验文本，她对上海的叙述，具有某种历史感与穿透力，创造了一种当代城市书写的叙述模型。不过，进入世纪之交以后，由于以传媒消费为主导的时代更迭，尤其是电视观赏取代了纸质化的阅读，那种传统的私人夜读式的作家文本逐渐

^① 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文学评论》2007 年第 1 期。